

从科学交流到科学研究： 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发展问题

黄颖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080)

[摘要] 认为情报学应该从研究科学交流的规律深入到研究科学研究的规律,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可以围绕为科学研究提供高附加值信息产品和服务进行业务重组。

[关键词] 科学交流 科学研究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业务重组

[分类号] G258.5

From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uang Ying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Points out that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should be deepened from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into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professional work in DICCAS should be reorganized by providing high value-added information products & servic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DICCAS re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 work

2000年适逢笔者在谈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又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心”)成立50周年,中心教育培训部和研究生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以示庆贺,研讨会的主题是: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中的文献信息保障,笔者在会上作了发言,会后对发言内容作了整理、充实和修订,形成了这篇文章。

1 情报学研究应该从科学交流深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学习情报专业四、五年,笔者理解情报学最初缘起于解决科学交流的无序化问题,为此,情报学对科学交流的规律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它以及其它一些理论指导下的图书情报工作也主要定位于为科学交流提供服务。但如果就此限定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交流,理由并不充分;相反,笔者以为,造成今天情报学很难自成体系,并逐渐与图书馆学、

信息(资源)管理学合流甚至被改头换面称为信息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有意无意的把情报学理论研究囿于科学交流领域。

我们判断一个学科是否独立存在,要看这门学科有没有有赖于与别的学科区分开来的独立的“内核”,个别研究领域有重合,或者都使用一些相近意义的概念,这些都还不足于用作判断学科关系的依据(更不能因为称谓相同而“拉郎配”)。“内核”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范式以及问题集等等很多方面的复杂的组合,目前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内核”,当务之急不是为它们谈婚论嫁,而是培养个性,促其成长。为此,笔者主张情报学率先垂范,在研究科学交流规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研究科学研究的规律。

什么是科学研究,笔者理解科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类似于机械劳动,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的灯丝一样,通过重复试验、细致的观察和检验,一般就能得出结

果(是,或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第二个层次就是创新,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发明发现的结果无疑可以和已有科学成果建立起逻辑联系,但发明发现的过程极有可能没有规律可循,似乎更依赖于瞬间的灵感或顿悟。笔者从情报学的角度理解:科学研究过程中,某研究者在某种情况下需要某种信息(主要用于刺激这位研究者进行一种思维的跃迁)并以某种方式加以获取和利用可以理解成随机现象,在总量上则可能表现出某种统计意义上的规律。如果这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笔者以为情报服务才能落到实处,否则,难免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因此,研究科学研究的规律,重点又在于对第二个层次作深入研究。在这个层次,则涉及到知识组织,科学家行为、科学家心理规律,研究群体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研究领域可能与别的学科有交叉重复,但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内容以及综合而成的组合效应上完全可以有所区分。

为什么说情报学要作这样的深化?从横向看,科学交流是科学研究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科学交流中的很多问题及其解释离不开科学研究这个大环境。从科学交流到科学研究,属于十分自然的学科拓展。从纵向也就是从历史来看,情报学于20世纪产生之初就是为了服务于科学研究,但出于满足当时科学界最急需的信息获取问题的需要,也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理论界的注意力长期局限于交流领域,对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规律的研究进行得相当不够,用户研究这一情报学分支领域作了一点深化的努力,但由于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情报学界对科学研究以及这其中的信息获取、利用的规律的认识还存在很多空白。这里,我们很难不提及来自非学术的一些考虑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由information做媒,情报学的核心概念——情报找到了信息这个富贵“亲戚”(笔者以为很有必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information、情报、信息在不同语系中的相对位置),外延迅速扩大,情报学的研究对象随之扩充,从科技到经济、从文献到比特,大有无所不包之势。而在目前的转轨时期,相当多的图书情报机构非常灵敏地把握了市场动向,看到搞信息资源大有“钱”途,抓住商机,及时地拓展业务范围,而且大多获得了成功。理论界不失时机的推出大情报观、大服务观,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否深化的问题被严重忽略,取而代之的是范围、概念之争。笔者以为,图书情报机构从事与情报(或称科技信息)有关或无关的业务与学术界探讨小情报观、大情报观虽然彼此有联系,但区别更为明显,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问题。前者是一种市场行为(就如同卖烧饼的看到烧饼赚不到钱,改去卖更赚钱的油条,并不需要理论界告诉他:“你放心卖吧,烧饼和油条都是面食。”);后者则是一种学术争论,学术争论固然要反映现实发展,但也一定要保持其独

立性,否则就与科学精神相悖了。

是不是情报学研究就不能拓展到科技以外的领域呢?也不尽然,但笔者以为,情报学在对科技领域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的情况下就涉足扩展到其它领域,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跨越多少领域,而在于研究是否深入和持久,笔者提出情报学研究对象从科学交流深入到科学研究中去理由也在于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仅仅研究科学交流的规律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力度已经越来越有限,不可否认,技术、体制上的诸多因素是造成今天图书情报界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但是,学术理论自身长期没有突破也难辞其咎——过去主要注重信息“流”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最终信息“源”和“宿”的研究。

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服务于科学研究大有作为

之所以在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发展问题之前先谈情报学,并主张情报学应该重视对科学研究规律的研究,笔者是基于这样的分析:目前图书馆事业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分化,所谓图书情报一体化,实质是部分图书馆弱化教育功能,建设情报服务职能,日益从传统的图书馆事业(仍然具有存在价值)分化出来,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丰富图书馆事业内涵的大胆尝试,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就是这类图书馆的一个代表。笔者十分赞赏这种尝试,并为此怀疑自己提出情报学研究应从科学交流深入到科学研究领域是不是为中心“量身定做”的。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作为科学院最重要的图书情报机构,曾经创造了喜人的业绩,然而时至今日必须承认,目前中心所能提供的服务与研究人员的要求有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客观原因一大堆,千头万绪,但用户没有兴趣和耐心去听,去分析,去理解,对他们来说,你的价值取决于你所提供的服务,如果你不能为其提供满意的服务,你就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

以前,因为获得资料的渠道有限,研究人员不得不访问图书馆。换言之,图书馆在信息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现在交流的渠道不仅多了、而且大大通畅了,如果你不能为客户(之所以说客户而不再说用户是为了强调图书馆一定要有服务意识)提供别处不能提供的特色服务,客户流失就是很自然的事。从现在发生的很多情况来看,传统的图书情报机构的确正处于一个重新设计未来发展模式的关头。做得好,在信息时代得心应手任你驰骋;做得不好,无声无息就此消亡。

笔者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图书馆学、情报学

(不管)尚待开
图书情
存在。
非所有
存在。
题:一
轨;没
营管理
标市场
键在于
变化的
基

略方向
议设立
未来的
或服务

长

流服务
十分突
果得以

一番彼

为方法

意义上

服务质

工作的

究案伊

究人员

研究活

着需求

改个称

笔

为,首

了一定

当规模

务是面

统计访

获取信

下,经

3 且

目

(不管用什么名称,实际上大家都不否认存在一个未知领域尚待开拓)存在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图书情报事业会存在;而图书情报事业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图书情报机构都会存在。社会进步依靠一些组织的可贵探索和积极改造,但并非所有组织都会因理论上的解释或其同行的存在而自然的存在。实际上,我国的图书情报机构正面临重新整合的问题:一部分图书情报机构(或业务)会被推向市场或向市场转轨;没有被推向市场的,也应该树立起市场化服务观念,在经营管理上主动变革,跟上社会信息需求变化的轨迹,找准目标市场,并服务于目标市场。这里没有什么通用的模式,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鼓励创新、动态可调的机制,确保对外界变化的高度灵敏性和适应性。

基于这种判断,笔者以为重新设计中心的战略定位、战略方向以及通向未来的战略措施十分必要而且紧迫,为此建议设立专门的战略策划部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并建议中心未来的主要工作应该是为科学研究提供高附加值信息产品或服务。

长时期以来,中心业务工作的主流可以称作是为科学交流服务,对纯粹的科学研究知之甚少且日渐脱离,馆藏地位十分突出,被动服务、简单服务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情况如果得以延续,前景不容乐观;要继续生存且发展得很好,非经一番彻底的改造不可。在笔者看来,图书馆业务管理可以分为方法上的和内容上的两个部分,方法上的管理不追求实质意义上的突破,而类似于一种亲善服务,例如送书上门、跟踪服务质量,馆内设咖啡厅等等;内容上的管理则应追求业务工作的实质性突破,例如设立课题信息联络人制度,建立研究案例库,从事知识组织的研究和试验,总之,不仅要帮助研究人员查找信息,还应该致力于渗透甚至参与到实实在在的研究活动中去。不要怕业务工作与现在大相径庭,只要是跟着需求变化走的,图书馆就还是图书馆,即使为了名实相符改个称呼也谈不上消亡,应该叫新生。

笔者以为,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服务于科学研究大有所为,首先,中心多年来为中科院各所提供文献服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优势;其次,科学研究领域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空间(在这里,我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图书馆服务是面向市场的),数量多、层次多、种类多,潜力大。不是有统计说研究人员要花多少多少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查找资料、获取信息和数据吗?如果我们能将这个时间尽可能压缩一下,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也相当可观。

3 应该进行业务重组和资本运作

目前理论界存在一个倾向:一方面强调图书馆提供的服

务要跟上社会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强调保持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构或公共服务机构的本色,但对前者讨论得多,对后者讨论得少,隐含之意,似乎图书馆是公共服务机构这一点在我国已经确定无疑了。其实不然,我国的图书馆在外形上颇象公共服务机构——强调公益性、面向社会公众、政府拨款等等;但在实际运作上却与典型的政府机关并无二致——官员由政府任免,业务工作要层层报批,实际上属于准政府部门。而且,图书馆作为非盈利机构的经营管理问题长期以来被忽视。实际上,非盈利机构的经营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讨论非常多、十分受重视的问题,有意无意的忽略它,对图书馆事业的伤害是致命的。

笔者以为,目前图书馆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方式(简称政府行为,不仅仅指政府对图书馆的管理,也包括图书馆自身的运作模式)不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在传统体制和技术状态下,政府运作方式就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因而那时候的图书馆也曾经“生意兴隆”;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少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政府行为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第一,技术发展、社会进步使得社会信息需求的内容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第二,科技、经济领域的改革逐渐深入,竞争对手和替代产品大量出现于信息资源服务领域;第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政府职能定位有了很大的改变;第四,目前还缺乏将用户对图书情报机构的评价转变为政府对图书情报机构进行投入、管理的有效渠道。

于是,一方面图书馆的传统社会需求空间日渐缩小;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对图书馆的支撑作用能力越来越有限。不经改造地继续沿用传统的政府行为去满足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相当于开着计划经济的拖拉机走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上,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图书情报机构应该切实重视经营管理问题,图书情报事业的存在并不代表所有的图书情报机构都能存在,只有那些很好地吸取现代管理理论中的思想和方法,并积极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的机构才能在信息时代找到一席之地。具体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笔者以为可以融合公共服务机构和现代企业这两种管理形式于一体。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该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能,例如提供基本的借还书服务,西方类似于图书馆这样的非盈利机构一般都通过比较明确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而作为现代企业,该汲取、借鉴和扩充的内容就更多了。

现代管理比较强调“虚拟经营”,“虚拟经营”要求组织中资源建立起某一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而将其它业务尽可能外包出去,从而使社会经济整体效率最高,组织的成本最

(下转第90页)

据库、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计算机应用文献数据库、中国专利文献数据库、中国科学技术成果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和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等,让读者掌握计算机检索的方法,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第6~7章,“网络服务和网络检索”,使读者了解现代网络信息系统,熟悉和掌握信息检索工具与方法,以及现代信息网络环境下信息获取的知识和方法。具体讲述如何通过WWW、Netscape及IE进行网络资源检索;如何申请电子邮件和使用电子邮件;如何使用FTP、Archie、Telnet、BBS、搜索引擎等Internet工具检索信息;并对电子图书馆和电子出版物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第8章,“信息的利用”,论述如何鉴别文献内容,信息收集的方法,如何从图书、期刊、专利等文献中分析信息以及信息素材积累的方法和形式等,以便使读者在获取信息后,知道如何利用信息。

总共8章的内容,传递了十分详尽的信息,包含了较为全面的信息检索知识。注重知识性与实用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统一,以及传统检索方法与现代检索方法的相互结合;又突出一个“用”字,即检索工具与方法的介绍占全书篇幅的60%以上,保证了检索技能训练的需要,强化了计算机检索手段和方法的应用。该书整体上采用“知识—方法—利用”的结构模式,体现“检索”与“利用”并重的特点,有助于读者触类旁通,全面地掌握和运用检索方法与技能,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

2 系统性

本书在编排时从基础到应用,从手工查询到计算机检

[作者简介] 陈秀莹,女,1971年生,助理馆员,发表论文数篇。

(上接第79页)

低,收益最大。中心在管理上也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将一部分业务从事业体制框架里剥离出去,按照公司制或独立的法人制运作,中心逐渐演变成由一控股实体及其所控股、参股、管理的若干公司或法人组成的集团。集团的每一部分只从事其最具竞争优势的业务,但整个业务组合起来,则是为科学研究提供高附加值信息产品或服务。在这种模式下,整个信息流水线(或称价值链,每一环节都增加了新的价值)上的不同环节按不同机制运作,可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每一部分的潜力。对于中心不具竞争优势的业务,则可以外包出去,与社会相关部门形成合理的分工格局。举个例子,中心的业务重点如果是查找和组合信息,提供高附加值信息产品或服

[作者简介] 黄颖,男,1976年生,硕士研究生。

务,从文献信息的收集、积累到文献的利用,贯穿着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的教学活动规律与逻辑思维方式,体现一部佳作所具备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的特点。该书从宏观上对全面资料采用了符合教学规律的逻辑次序进行布局谋篇,在微观上,对于文中所列的重要检索工具则采用体例一致的阐述方法:即导言、正文、辅助索引、查找途径与实例,达到了系统完整与条理清晰的效果,便于学习和掌握。

3 理论联系实际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理论概念与实际技能的紧密结合。本书在编写时紧紧抓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首先,在“检索策略探讨”一节中,作者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提高检索策略质量和检索效果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并结合具体的例证介绍,使读者更容易领会;其次,在介绍手工检索工具和光盘数据库概况之后,都列有检索实例和检索示意图,对读者掌握各种文献检索工具及其操作方法是很有帮助的;第三,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网络信息检索直观明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网络操作。

4 通用性

本书在编写时内容简明扼要,既选用了一些综合性检索工具,也选用一些典型的检索工具,因而适用面比较广,各大中专院校、科研单位、教学培训单位都可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大专以上水平的干部、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自学和参考。

务,那么大规模数据库的建设则不一定要由自己亲自来做。

为了控制和监督与我们中心业务有一定利害关系、但中心自身无法承担的业务,为了应付新的替代产品或潜在竞争对手的出现,为了保证中心和其上、下游业务(出版社、书店、信息经纪机构等)协调一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它方式组建战略联盟,或者参股、控股,甚至兼并收购。可以断定,未来我国图书情报机构的整合离不开这些工具、手段的灵活应用。

我们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目前的体制转轨时期,不仅仅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有的图书情报机构都应该树立市场观念,找准市场定位,设计好战略目标,并致力于积极主动的变革。

poi

北京
编目》一
全书,笔
目逐渐计
的新形变
该书内容

1 内

1.1 具
具
编制体制
述中文
目,略及
体例上着
中文文摘
为一体,
打破我国
信息资源
尝试在巨

收